

福建近代第一张华人报纸《福报》出版始末

龙超凡^{1,2}

(1.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中国教育报刊社 福建记者站, 福建 福州 350003)

[摘要] 1896年, 福建闽清人黄乃裳在福州创办《福报》, 这是福建近代第一张中国人自办的报纸, 它打破了外国人在闽办报的垄断局面。《福报》是一张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性报纸, 在福建新闻事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福报》于1897年5月停刊, 其停办原因主要是资金缺乏、债台高筑, 而不是受外界胁迫。日本人将其收购, 改办《闽报》。

[关键词] 黄乃裳; 《福报》; 《闽报》; 出版始末

[中图分类号] K 2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9) 02-0132-05

福建近代新闻事业始于19世纪中叶, 即英国商人于清咸丰八年(1858)在福州创办出版了英文报纸 *The Foochow Courier* (《福州府差报》, 又称《福州信使报》)。此后30多年至1895年间, “英、美商人在福、厦两地先后办英文报纸约9家”、“英、美传教士出版中文报刊7种, 拉丁文拼音福州、闽南方言4种, 英文1种”^[1], 福建的报业出版完全被外国人所垄断和操控。这些报刊各有所图, 不能视作真正意义上的福建近代报刊。

打破这个垄断局面的荣耀当属黄乃裳(1849—1924)。1896年, 黄乃裳独自筹资创办出版《福报》, 这是中国人在闽创办的近代第一张报纸,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黄乃裳, 字绂丞, 号慕华, 晚号退庵居士, 福建省闽清县六都湖峰人, 是清末民初的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曾多次参与办报或开办报馆, 著作较多, 也是一位著名报人。“《福报》诞生于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它不是一张商业性的报纸, 也不是宗教性的报纸, 而完完全全是一张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性报纸”。^[2] 基于此, 研究《福报》的诞生与停刊背景, 对了解、认识福建近代报刊出版特点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有关黄乃裳和《福报》的研究成果虽已有一些, 但有关《福报》创刊年份、存续时间的背景问题却

鲜见系统阐述。

为更好地研究黄乃裳办报史、福建近代民报命运和出版状况与所处时代政治历史的关联, 有必要对《福报》的诞生背景与停刊原因进行考证, 以供学界参考。

一、黄乃裳创办《福报》的背景条件

《福报》的创刊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月十六日(1896年4月28日), 报馆设在福州仓前美华书局, 由福州美华书局印发。《福报》宽约25厘米, 长22厘米, 铅印, 单面对折, 8页, 4号字直排, 文言不断句, 每周二、五出版。每期第1页刊载评论文章, 第2页至第6页刊载新闻, 第7—8页刊载商业广告。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目前已发现和现存的《福报》创刊号等56期报纸可以证实。那么, 为何黄乃裳能在1896年自主创办和出版一份民报呢? 黄乃裳出版《福报》目的何在呢?

(一) “公车上书”成为兴办民报的重要动因

鸦片战争之后, 福州、厦门被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 以英、美两国为主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涌入福建。正是随着外国侵略势力入闽, 福建近代报刊才开始渐渐出现。清咸丰八年(1858), 英国商人在福州创办英文报纸 *The Foochow*

Courier (《福州府差报》), 从而开启了外国人在闽办报的时代。此后直至 1896 年《福报》创刊, 外国人独占福建报刊业。在此期间, 福建也没有官报、民报创刊出版, 主要原因在于清廷对报刊出版的严格控制。

1894 年, 中日爆发甲午战争。1895 年 4 月 17 日, 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 其核心内容是: 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 赔款白银 2 亿两。对此, 康有为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 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 是为“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其发起的“公车上书”中强烈建议“纵民开设”报馆, 后来又再次上书提出办报、阅报的建议, 即:

四曰设报达聪, 《周官》训方诵方, 掌管方愿方志, 庶周知天下, 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 州县乡镇亦令续开, 日月进呈, 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 虽乡校或非宵旰寡暇, 而民隐咸达, 官愿皆知。中国百弊, 皆由蔽隔, 解弊之方, 莫良于是。^[3]

“公车上书”冲破了清政府的言论禁忌, 将清政府对新闻舆论界一贯执行的“言禁”“报禁”政策撕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于是, 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 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发行报纸, 宣传维新思想, 以广开民智。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就是在“公车上书”背景下萌芽和发展的。出于宣传维新思想之需要, 1895 年 8 月 17 日, 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 出版了 45 期后更名为《中外纪闻》。1896 年 1 月 12 日, 上海出版了《强学报》。这两份民报的宗旨都是宣传变法维新。正是有了这两份民报创刊的“前车之鉴”, 曾参加“公车上书”的黄乃裳才认识到可以自主创办报刊宣传变法维新。詹冠群教授认为, “从版面上看, 《福报》极似康有为门人徐勤、何树龄在上海所办的《强学报》(1896 年 1 月创办)。由此亦可窥见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黄乃裳的影响”。^[4]事实上, 黄乃裳的变法维新思想集中体现在《福报》每期评论文章上, 每篇评论约 25 行、1 100 字, 个别长文章则多次连载。如, 第一、二期报纸刊载《福州宜设报馆说》, 第五期刊载

《贬愚篇》, 第六期刊载《醒固篇》。这些评论文章大多数是黄乃裳所写, 文章主旨是: 变革维新、富国强兵, 广设学堂、培才用才, 发展实业、振兴商务, 反对迷信、革除陋习。黄乃裳创办《福报》声援变法维新的意图, 流露在字里行间。

继《福报》之后, 全国各地陆续有宣传变法维新的报纸创刊。如, 1896 年 8 月, 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创办于上海; 1897 年 10 月, 严复于天津创办《国闻报》; 1897 年 4 月, 唐常才等在长沙创办《湘学报》……辛亥革命前宣传变法维新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说明清政府对地方管辖治理能力大大削弱。而这, 也给了诸如《福报》等民报以创刊契机。无疑, 大批宣传变法维新的民报诞生, 也加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进程。

(二) 黄乃裳已具办报经验

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由黄乃裳创办并非偶然。黄乃裳的家庭累世务农, 孩童时的黄乃裳先是由三叔黄庆涵教认识字, 8 岁入私塾。除了私塾里教的《四书》《五经》外, 黄乃裳广泛阅读其他的经、史、子、集等书籍。不过, 此时黄乃裳的思想仍受封建的传统、乡村的环境所束缚。1866 年, 基督教传教士薛承恩 (Nathan Sites) 来到闽清六都传教, 黄乃裳经常去旁听。同年 12 月 16 日, 黄乃裳受洗入教, 与族叔黄福居一道成为闽清县首批基督徒。

供职于教会后, 黄乃裳读书与作文机会更多了。1872 年, 美国传教士保灵 (S. L. Baldwin) 牧师聘请黄乃裳专理天安堂文案, 从事文字工作。“黄乃裳常常帮助教士们解决译文中的问题, 协助他们以文言文或福州方言翻译教会读物。如以福州话译《旧约全书》, 协助保灵牧师译《美以美纲例》, 协助薛承恩译《天文图说》《圣经图说》《卫理斯传》, 协助美国教士武林吉 (Franklin Ohlinger) 译《丁大理传》等等。”^[4]正是因为黄乃裳协助传教士翻译教会刊物, 体现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底, 取得了传教士的信任, 为黄乃裳从事教会报刊编辑工作奠定了基础。

1874 年, 美以美会创办会报《郇山使者》月报, 黄乃裳被任命为编辑, 开始了生平第一次办报。黄乃裳在《郇山使者》月报上发表过劝

人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文章,“还与保灵夫人合写了《革除缠足论》5篇,揭露并抨击了封建陋习残害妇女的罪恶,洋洋洒洒万余言”。^[4]在从事《邹山使者》月报编辑工作期间,黄乃裳初步认识到报刊的宣传作用,也积累了一定的办报经验。若没有《邹山使者》月报的编辑经历和经验,黄乃裳不可能自主筹资办报。由于“公车上书”前在福建办的教会报刊担任编辑工作的中国人甚少,而严复、林白水等福建人主要在其他省份活动,故黄乃裳成了在闽创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人。

(三) 黄乃裳办报动机源于国恨家仇

1894年9月17日,清朝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展开血战,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最为壮烈的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将领邓世昌、黄乃模(1862—1894)率“致远”舰等拼死抗敌,并以受伤之舰撞击敌主力舰“吉野”号,全舰官兵25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黄乃模是黄乃裳的嫡亲三弟,他们的父亲是黄庆波、母亲林氏。1883年黄乃模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牺牲前协助管带(总兵衔)邓世昌指挥“致远”号巡洋舰。黄乃模的壮烈牺牲,给了身为大哥的黄乃裳沉重一击,心中极为愤懑。而随之而来的中国战败求和、割地赔款,黄乃裳更是“忧心如焚,经常夜不能寐”。

其实,随着社会认识的深化,黄乃裳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甲午战争之前,黄乃裳寄希望于依托教会学校的教育开启明智,以求国富民强。甲午战争之后,黄乃裳意识到依靠基督教使中国摆脱贫穷与落后并不现实,这个路子行不通。参与“公车上书”后,他开始直接介入社会政治活动,成为一名维新志士。在《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一文中,黄乃裳首次表达了变法维新思想,也表达了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慨与国家前途的忧虑。从以下这段文字可见一斑:

通商之事,是天大有造于我中华,而不欲使四百余兆之百姓饥饿转死于沟壑也。不然,海禁即开,彼之学问日辟,商务日兴,我之因循如故,委靡如故,无论国势愈趋愈下、政治愈久愈衰,即此四百余兆百姓其能自甘束缚,而饥饿转死于沟壑耶?而况乎新败于日本,割地求和,被索兵费二十千万两,国中准其设立租界制造土

货,试合目思之,此后其将何以为国也?^[5]

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以政论文章参与和支持变法维新,是黄乃裳受康有为等启发而亲自为之。正是国恨家仇交织在一起,力图救民于水火的担当,黄乃裳创办《福报》呼之欲出。

(四) 创办报刊的资金与场所等问题的解决

创办报刊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黄乃裳经济并不宽裕,从他多次办报和海外开垦农场屡获亲友资助来看,其办报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也就是—些富商和好友的资助。至于报刊印刷问题,黄乃裳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利。“印刷较容易解决,因为教会有个美华书局,黄乃裳在为教会办《邹山使者》月报及编辑年会录时,曾与美华书局有过很好的配合。黄乃裳与他们商量时得到了大力支持”。^[4]所以,黄乃裳创办的《福报》依靠美华书局的场所和设备完成报纸印刷工作,故《福报》报头赫然印着“福州美华书局印发”。也正因为此,学者周佳荣误以为《福报》由福州美华书局创办。周佳荣在《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一书中认为,《闽报》前身是1896年4月28日福州美华书局创办的《福报》。

二、《福报》停止出版的时间及原因

从学者们已收集到的《福报》和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尚存《福报》56次(期),始于1896年4月28日的创刊号,终于1897年1月29日的第80次,其中1896年有51次、1897年有5次。由于《福报》的停办当次(期)报纸亡佚,故停止出版时间尚有争议,俟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一) 《福报》停刊时间考证

关于《福报》停办时间,黄乃裳在《绂丞七十自叙》中说,《福报》办了两年余,“亏损二千八百余金”,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停办。由于《福报》每周出版2次,若按黄乃裳所说创办2年,那么据此推算,《福报》至少出版200多次,停刊时间至少在1898年4月之后。这与《闽报》创刊日期存在冲突。“《闽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1898年1月)创刊,系在福州的日本人前田彪、井手三郎在台湾总督

府拨款支持下，买下《福报》设备而创办的中文报纸。”^[1]可见，《福报》不可能于1898年4月之后停刊，《福报》不可能办了两年多。陈遵统在《福建编年史》第9辑中指出，《福报》开办一年，资本折尽，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宣告停办。詹冠群对陈遵统的研究予以肯定：“陈氏还注明了根据：一是从《中国文化出版史料初编》之说；二是长乐董藻翔（光绪丁酉举人）藏有从发刊至停办的各次《福报》，陈氏亲手翻阅过几次，印象很深，但后来亡佚了。”^[6]清末报纸所载出版日期为农历月日，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也就是阳历1897年5月。

还有一个证据也可以证明黄乃裳回忆的《福报》办报存续时间是错误的：《福报》停刊后，被日本人收购后更名为《闽报》；现存最早的一份《闽报》是发行于1898年1月4日的“第六次”，而《闽报》办刊初期的出版周期是每周发行两次，由此推算《闽报》的创刊号时间是1897年12月17日。由此，黄乃裳所说《福报》“刊以二年余”自然站不住脚了。综上分析，笔者亦认同《福报》停刊日期为1897年5月。

（二）《福报》停止出版的主要原因

“早期国人办报，面临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十分薄弱，还未能能为报刊生存与发展提供足够的条件。”^[7]类似于《福报》的许多民报，由于自身经济和外在政治因素等原因，存续时间一般很短，休刊、停刊、更名再创刊的现象十分普遍。黄乃裳在《绂丞七十自述》中写道：

而回溯四十年来办报经六次矣，前以《卹山使者》教会报，星洲《日新报》、《左海公道报》，皆受聘不投资。至《福报》，则独立办理，刊以二年余，亏蚀二千八百余金。厦报虽蒙诸有道倾助，而余与刘君伯瀛，各有所垫，一时社会欢迎，以为与《福建新报》可称伯仲。两报仅周岁，闽政府不能容。^[4]

由此可知，“闽政府不能容”的“两报”是指《福建日报》和《伸报》，《福报》停办的原因主要是“亏蚀二千八百余金”，黄乃裳并未言及停刊与政治等外在因素有关。对此，詹冠群教授亦表示：“黄乃裳办报一年，亏损了2800多

元。他四方告贷，债台高筑，后来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不得不在1897年5月停刊。”“这时福建风气未开，报纸未见重于社会，《福报》每期仅售出数百份。”^[4]也就是说，《福报》的销售数量较少，导致《福报》亏损、黄乃裳负债，这是《福报》停刊的主要原因。

《福报》被日本人收购，其停刊是否受到日本人的胁迫呢？黄乃裳是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有关黄乃裳转让《福报》的细节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忽略，或相关资料遗失，而黄乃裳的《绂丞七十自述》也未记载。黄乃裳究竟以多少资金出让《福报》、与日本人达成什么协议，有待查证。不过，日本人收购《福报》的缘由及过程在日本相关资料中有比较详细地记载。“据前田彪说，他于明治三十年（1897）受日本海军省军令部的命令，以谍报员身份驻任福州，见当时福建省闽清县举人黄乃裳（1849—1924）主办的《福报》屡有排日言论，而生收购该报之意，遂与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省军令部一同嘱托宗方小太郎进行协议，并向拓展殖民事务大臣高岛鞆之助探问收购方法。高岛转与乃木希典商量，结果乃木决意收购。”^[8]这表明，对于《福报》，日本人与黄乃裳是“收购”和“转让”的关系，不存在胁迫。《宗方小太郎日记》也有如下记载：“依据1897年的宗方日记，这一年的7月，海军省提及收购《福报》一事；直至同年10月，宗方小太郎和井手太郎才由福州渡海抵台，拜会总督乃木希典。在达成相关协议之后，11月，宗方由台湾回到日本。同行的井手则返回福州，与在福州的前田彪合作，从事创业。12月，《闽报》创刊。”^[9]这也清楚地表明，日本人与黄乃裳“达成相关协议”而“收购”《福报》，也没有谈到使用武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迫使《福报》停刊并收购该报。另外，值此期间，日本虽通过甲午战争窃据了台湾，但福建并未沦陷，日本在福建的势力尚弱，故日本人尚无法借力清政府来对《福报》施加压力迫其停刊转让。

三、结 语

黄乃裳创办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并非偶然，而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黄乃裳少年识字读书,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青年时,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参与编辑《邹山使者》月报,使他接触到一些西方文化知识,扩大了知识视野,也使他越发认识到积贫积弱的清政府腐朽无能。“公车上书”后,清政府长期封闭的“言禁”“报禁”大门被冲破,民间人士开始创办报刊,发表政论文章,迎来民报勃兴时期。在此背景下,黄乃裳也萌发了参与政治的热情,自主筹资在福州创办《福报》,以报纸言论支持和声援变法维新,与《万国公报》《强学报》形成呼应之势。

然而,和许多民报一样,《福报》也未摆脱“短命”的厄运。由于“福建风气未开”,报纸销售数量比较少,以致亏损严重,“债台高筑”的黄乃裳不得不停办《福报》。日本人收购《福报》,是在该报已停办半年之久的事情。所以,该报停刊直接原因是经济亏损,受外部政治因素影响则较小。日本人决意收购《福报》,与《福报》“屡有排日言论”有关,也与日本原本就要在福州设立报馆宣传其国策与主张有关。

《福报》开办时间虽只有一年,但却是福建近代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是一份宣传变法维新的民报,对福建近代报业的出版与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由《福报》命运可以折射出,中国近代的民报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与发展的,其

出版是民间人士出自救国救民的自发行为。由于报纸销售量少、缺乏雄厚资金等原因,清末民报存续时间都较短。《福报》等民报的出版,其意义极其重大,它打破了清政府对新闻舆论采取的“言禁”“报禁”政策,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加快了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进程。

[参考文献]

- [1]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志·新闻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 [2] 徐明新. 福建新闻史(1645—1949) [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9.
- [3]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4] 詹冠群. 黄乃裳传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 [5] 黄乃裳. 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 [N]. 闽省会报, 1895-06-01 (17).
- [6] 詹冠群. 关于黄乃裳研究中的几个史实问题 [J]. 福建论坛, 1990 (6): 58-62.
- [7] 王润泽. 中国新闻传播史新编 [M]. 福州: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5.
- [8] 周佳荣. 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 [9] 毛章清. 日本在华报纸《闽报》(1897—1945) 考略 [J]. 福建论坛, 2010 (2): 121-127.

The Publication of Fujian's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Fu Bao” in Modern Times

LONG Chao-fan^{1,2}

(1.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China Education Press Fujian Correspondent Station, Fuzhou 350003, China)

Abstract: In 1896, Fujian Mingqing people Huang Naishang founded “Fu Bao” in Fuzhou, and this is the first in Fujian Chinese newspaper, which broke the monopoly of foreign newspapers in Fujian. “Fu Bao” is a political reform newspaper publicity reform, and Fujian has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Fu Bao” was closed in May 1897, and the main reason is the lack of funds rather than to stress. Japanese bought it and changed its name to “Min Bao”.

Key words: Huang Naishang; *Fu Bao*; *Min Bao*; publicati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